

给作家张抗抗题的，则是：“看朱成碧且由他，大道从来直似斜。见说洛阳春索寞，牡丹拒绝著繁花。”张抗抗忍不住感叹，汪老的诗“耐人品味”。

不仅是诗，长短的题跋往往也是一篇篇绝好的小品文，寓有深意。比如1984年画的《子瞻样》，配文是他在《宋朝人的吃喝》里提到的：苏东坡是个有名的馋人，但他爱吃的好像只是猪肉。他称赞“黄州好猪肉”，但还是“富者不解吃，贫者不解煮”。他爱吃猪头，也不过是煮得稀烂，最后浇一勺杏酪——杏酪想必是酸里咕叽的，可以解腻。有人“急出新意”以山羊肉为玉糝羹，他觉得好吃得不得了。这是一种什么东西？大概只是山羊肉加碎米煮成的糊糊罢了……这篇题跋几乎可看作作为“吃货”的汪曾祺对宋代老前辈的致敬与解读，分外有趣。

而在两幅画有僧人的作品中，他又分别题了“甚麽？”“狗矢！”《甚麽？》中，有一和尚正在打坐，但双目怒睁，嘴角向下，似乎是周边发生了什么事，令他忿忿不平，又或受到惊吓。《狗矢！》中的和尚双眼紧闭，双臂拢于袖管，下垂的嘴角也透露着某种不屑和厌恶。一旁的感叹词“甚麽”“狗矢”连带标点符号“？”“！”，更是加剧了这两幅画的戏谑含义。由此可见，越是到老境，汪曾祺对于这个世界越是有不满、不屑，他就是要让那个僧人的眼睛半睁半闭起来，他不想搭理你们。此时，汪曾祺的画逐渐由“萧萧”转成“鲜浓”。他作文不再是“人间送小温”，他的“宿墨残笔”也不再只是“画芳春”，在他的晚年，他走向了他的文学和书画艺术共同的“人书俱老”，却依旧不改



上图：茨菇。

赤子之心，只是多了一分无奈，几许不解。这样惊世骇俗的标题，很容易让人想起禅宗的“当头棒喝”，不知道愤恨于什么来，必得骂一声才又能过瘾，让人想起白石所画的《人骂我，我也骂人》，可谓有异曲同工之妙，意在画外之心。

有意思的是，汪曾祺的人生观、创作观，许多也是通过对书画艺术的追求与比喻来加以说明的。比如从构图看文字与语言的安排：“中国人写字，除了笔法，还讲究‘行气’。包世臣说王羲之的字，看起来大大小小，单看一个字，也不见怎么好，放在一起，字的笔画之间，字与字之间，就如‘老翁携举幼孙，顾盼有情，痛痒相关’。安排语言，也是这样。一个词，一个词；一句，一句；痛痒相关，互相映带，才能姿势横生，气韵生动。”在他看来，语言和写字、绘画的布局构图一样，都要前后呼应、相互兼顾。再比如谈到短篇小说创作，汪曾祺认为这与人的气质有关，有人气质如大江大河，适合长篇巨制，而他自己则是小桥流水式的，只能写短篇，就像“倪雲林一辈子只能画平远小景，不能像范宽一样气势雄豪，也不能像王

蒙一样烟云满纸”。在谈到“创作的随意性”，汪曾祺举齐白石画荔枝、郑板桥的“胸有成竹”等例，说明作文和写字、画画一样，作品完成以后不会和构思时完全一样，“殆其篇成，半折心始”。特别是说到自己的气质，汪曾祺更表示：“我永远只是一个小品作家。我写的一切，都是小品。就像画画，画一个册页、一个小条幅，我还可以对付；给我一张丈二匹，我就毫无办法。”在汪曾祺看来，书画和文学是相通的，书画之道同样适用于文学创作。如果没有书画创作的切实经验和体悟，没有书画方面的深厚学养，他的文学世界不会是这个样子。正如他在《我的创作生涯》中谈的那样：“我的喜欢看画，对我的文学创作是有影响的。我把作画的手法融进了小说。有的评论家说我的小说有‘画意’，这不是偶然的。我对画家的偏爱，也对我的文学创作有影响。我喜欢疏朗清淡的风格，不喜欢繁复浓重的风格，对画，对文学，都如此。”

烹饪、书画、文学、戏曲、曲艺……构成了汪曾祺丰富的艺术人生。而在其中，绘画无疑是他毕生的爱好，并且对其文学创作产生极大的影响，这一点他自己也深以为然：“喜欢画，对写小说也有点好处。一个是，我在构思一篇小说的时候，有点像我父亲画画那样，先有一团情致，一种意向。然后定间架、画‘花头’、立枝干、布叶、勾筋……一个是，可以锻炼对于形体、颜色、‘神气’的敏感，我以为一篇小说总得有点画意。”说到底，老头一辈子都不曾改变，他自始至终，一直是那个喜欢倚在父亲画案边耳濡目染，专心致志且兴奋不已的赤诚小子。■